

中国

社会性质问题

论战

(资料选辑)

高 军编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 社会性质问题 论战

(资料选辑)

高 军 编

上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一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后开始的。但是，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并不是从这时才争论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社会都提出过一些见解，揭示过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但都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的认识中国社会才开始了。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来认识中国的国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逐步加深认识。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他们运用列宁的殖民地理论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从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一大”时认识还比较笼统，到“二大”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宣言，明确地分析了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没有不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配的，“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在经济上“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在政治上则“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为此，提出了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一大进步。通过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这个认识得到了更多人的接受。

但是，对于这种认识并不是都同意的。比如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就有争论。这

种争论不仅在国内有，就是在苏联在共产国际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而且由于他们的争论，直接影响到国内的争论。当时，在苏联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代表的少数派和以斯大林、布哈林等代表的多数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明显地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而且争论的很激烈。托洛茨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只是从现象上看到，在中国的大城市有资本主义企业，在一些地方有资本主义的农场，认为封建主义压迫在中国已经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只是“残余的残余”，据此断定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认为只是由于海关制度不好，搞个海关革命就可以了。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等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拉狄克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国家。他说：由于商业资本在中国已有久远的历史，已经蚕食了封建势力，所以他认为现在中国农村已没有封建势力存在，“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①对于这种观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多数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明确指出：封建势力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帝国主义就是通过扶植它们来实现统治中国，支配中国近代工业，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特权，是中国的太上皇。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还有许多半封建制度残留着，^②因此，认为中国当前的革命就是反帝反封建。

在苏联的这种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特别是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使人们又

①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版。

②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六大以前”第62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产生了疑问，而决定这个问题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尖锐地提出来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曾具体分析了这个问题的争论情况。他说：“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变动（按：指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所以在这样历史的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要感觉是新的。”他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这就是说，当时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至少就有上述三种观点：一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封建；二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就是反帝反封建；三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反资产阶级。这三种观点的立论根据，第一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以反封建，搞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种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要反帝反封建，搞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第三种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要反对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及稍后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二

首先挑起这个问题争论的是托陈取消派。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成为取消主义者，并和国际上托派搞在一起，贩卖托派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在关于中国革命

问题致中央的信中说：“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中国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革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陈独秀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商业资本主义，它已经破坏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关系，又加上蒋介石取得政权这种政治变动，封建关系已成残余的残余，在经济政治上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中国现在从经济到政治都已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完全是托派观点。实际上他们认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议会”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了许多歪曲的宣传。

另外,还有“新生命”派。这是以反动文人陶希圣为代表。一九二八年陶希圣与周佛海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生命》,由此而得名。陶希圣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得力干将,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他在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在《新生命》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等等文章,歪曲中国当时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他所谓的“帝国主义”不是指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指明朝以来和中国通商的外国商人;“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敌对矛盾的;“封建势力”指的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而士大夫阶级与地主并非一物”。他还捏造了不反帝的中国资产阶级,即所谓“新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阶级”。这种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是十分明显的。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广大人民迫切需要明确,蒋介石建立了他的反动政权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当时称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是否已经完成?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否发生了质变?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就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所以,当时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社会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哪里发展?是革命实践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党内开展了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在斗争中就涉及到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李立三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批驳了托陈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反动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了这个任务。他们通过合法的或秘密的方式,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利用大学讲坛,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一九三〇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了。这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组成部分。它把进步的社会科学家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实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总任务,提出了自己的战斗纲领,规定了社会科学家的主要任务:“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予一般;3.严厉地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5.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①根据这些任务,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地开展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王学文等在上海出版《新思潮》杂志,一九三〇年四月,他们在《新思潮》月刊第5期,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②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③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④、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其中潘东周和王学文的文章是代表作。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了分析研究,着重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严重的影响。”“帝国主义

①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

② 据王学文、吴黎平同志讲,潘东周曾任李立三的秘书,后被敌人枪杀。

③ 向省吾原名傅学铎,立三路线时在一次聚会中被捕牺牲。

④ 《新思潮》发表此文时,在目录中署名王学文,在文章中署名王昂。

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本主义的势力,加紧的向中国整个经济进攻。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他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①同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占支配的地位。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占压倒的优势。无论“就地域的面积说来,不过少数大都市和少数地方;就发展的程度说来,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中国的民族工业,还只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初期时代的轻工业。”^②他们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驳斥了托洛茨基派、“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歪曲中国经济性质的观点。他们因创办了《新思潮》杂志,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所以时称“新思潮派”。

新思潮派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后,托派分子严灵峰和任曙立即跳出来反扑。他们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来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严灵峰曾参加托派王平一等组织的“战斗社”(出版《战斗》杂志而得名,只出了一期),一九三〇年七月又参加创办《动力》杂志(只出了两期,七月十五日出了第一期,九月三十日出了第二期),先后发表了他的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和《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后来以这两篇为主又加了一篇《我们的反批评》及《序言》,编成《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一九三一年六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他还写了《追击与反攻》一书。因他的主要文章在《动力》上发表,时称他们代表的叫“动力派”。任曙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间写了一本《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出版,一九三二年二

① 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

② 王昂:《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

月一日又出了修订版),他还在《读书杂志》上写了几篇文章。何干之同志曾经讲:任、严“他们所抱的见解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他们的方法论和见解,非常机械,所以我赠给他们一个名衔叫‘机械派’”。^①任、严之间也有矛盾,在他们的文章著述中也经常出现对骂。严骂任是“侦探先生”;任骂严是“叛徒”、“机会主义”者;严又回敬任是叛徒理论家、“下流的经济研究家”、“过左专家”、“小家伙”;任又讥笑严是“东抄西袭”;严也讥笑任是“创造大家”、“经济通”,所说的是“先天理论”。他们这对骂是不是说他们的见解是根本对立的?不是的。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他们闹是非、争正统,言辞上确实有不少意气话,但从本质上看,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严灵峰说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势力,任曙也是这样看的;任曙认为中外资本要不分彼此,同等看待,严灵峰也是这样辩解的。同时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发展就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严灵峰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势力为其后盾。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②(着重号是原有的,下同。)任曙则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所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③除了任、严,当时托派中还有刘镜园。据王

①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5—76页,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8年3月版。

②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序言,新生命书局1931年6月30日出版,第8—9页。

③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

学文讲就是刘仁静。他当时在上海艺术大学教书，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一九三一年八月在《读书杂志》1卷4、5合期上他发表了《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读书杂志》2卷2、3合期上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他是在任、严被揭穿了真面目已经很臭之后，为了坚持其观点，但又不能原封不动，只得以批判者的面目的形式出现。他经过改头换面最后还是说：中国现在是一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是“买办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的变种。实际上刘镜园兜了一个大圈子，贩卖的还是托派的基本观点：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只不过没有公开用这个名词，改了一下面目罢了。所以刘镜园的宣传公式是：“资本主义就是落后的资本主义，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是买办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就是商业资本主义。”^①

托派是这次论战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派的主要对立面。此外，还有一些人标榜自己对两方面都不尽同意，对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种种说法。如孙倬章在《中国经济的分析》中提出中国社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统治的地位，而政治上又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的地位”^②；胡秋原在《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金如海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略评》一文中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落后资本主义社会”^③。罗敦伟在《中国统制经济先决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社会是“变质的封建社会”^④。方亦如在《中国经济问

①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116页。

② 孙倬章，四川人，留法学生。早年组织过社会民主党。写过一本书叫《么样干？》，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1931年8月《读书杂志》第1卷4、5合期上。

③ 见《综合》创刊号，1934年5月1日出版。

④ 见《中国经济》第1卷第7期，1933年10月25日出版。

题》中说中国是“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①。等等。

当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等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反扑时，我党又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国经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驳托派的观点，宣传我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赖田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伯虎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思云^②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③何史文的《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宇宙的《现代中国经济性质的探讨》，刘苏华^④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钱亦石的《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杜鲁人^⑤的《中国经济读本》，等等。同时，在一些大学里，党还组织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利用讲坛、学术讨论会、墙报等形式对托派进行了斗争。这场斗争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是比较大的。当时一些社会科学的出版物大都参加了这场论战。最后，是托派、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被进步的人士所唾弃，而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

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围绕着这个中心

① 方亦如，又叫祝伯英，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② 据王学文同志说，思云是他的笔名。

③ 据王学文、吴黎平同志说刘梦云是张闻天的笔名。

④ 刘苏华，入党很早，曾因反对四中全会被开除出党。后来又回到党内来。因和江苏省一个人有分歧，又被开除出党。抗战时又回到革命阵营，在山西一个刊物上写过文章，以后在山东分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他在这次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代表马克思主义，对托派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⑤ 据王学文同志说杜鲁人是何干之的笔名。

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

对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托派认为帝国主义“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严灵峰认为：“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他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①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要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②甚至说：“中国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阀制度”，也失去封建的经济基础，“不依赖于帝国主义，便依赖于买办工商业者和乡村的新式地主。”^③总之，他们认为自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从城市到乡村都资本主义化了，中国封建势力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被“破坏”了，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残骸”。在中国社会里已是无足轻重的了。

托派在谈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影响“在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前进”，^④他们甚至带有极大感恩来颂扬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们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一特性已久为谈中国经济问题者所公认；同时现在乃至将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想亦人们所不能否认。这样，又怎能仅看见中国资本主义而不看见在其上统治着和在其内盘据着的庞大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里，谈中国资本主义尚不能离开帝国主义，何况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单看国货的资本主义，亦必须首先把握着这外来的资本帝国主义

①③④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②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序言”第9页。

问题。”^①

为了自圆其说，托派捏造了许多可笑的“论据”。

托派说，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认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作用，就是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任曙说：“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变动的动力。”^②由此，甚至把所谓帝国主义投资问题，也仅看成是一个投货问题，一个入超问题，即是一个对外贸易问题。任曙认为：帝国主义“在投资问题中，亦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的问题在。很显明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关于后者，历年来的对外贸易入超，就是投资的来源，亦是投货的结果”。^③他们还从海关册上照抄了所谓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对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影响，妄图说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最根本的动力。

托派为了讨好和美化帝国主义，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编造了所谓“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分不开的好兄弟”，华洋资本应该“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的谬论。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成分”，因为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好象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内合股合营”^④一样，“这两者之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看来，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量差别”，“不存在本质

^{①②③}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

^④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不同的矛盾”，“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①任曙说：“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绝对不应当随时随地把整个资本主义中给他划分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的资本主义，那是洋货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时。”^②严灵峰也同样主张：“不能将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矿山、铁路等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③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主义”应当“当作统一的中国经济看待”，华洋资本加起来“就是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④从而得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

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阻碍下，中国民族工业的跛足的、瘫痪的畸形发展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但大谈“辩证法”的严灵峰竟用诡辩来颠倒黑白。他一面不得不承认帝国主义“相对的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采取种种政治的、军事的、关税的、财政的政策来限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达”。同时他又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了交换的范围，输入机器、航业、银行、铁路、工厂等等的投资，又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帝国主义在两方面的进程中，它不能够压制整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⑤相反，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十分迟滞不进”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内部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超过于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⑥为此再次感谢帝国主义，“把落后的中国拖进了一步”，走向了“资本主义”^⑦。他认为不能说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算不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经济有了有机的组成，于是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发展重工业，能够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实际上在帝国主

① 严灵峰：《追击与反攻》第138、154页，神州国光社1932年11月版。

②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

③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④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

⑤⑥⑦ 严灵峰：《追击与反攻》第153、154、155页。

义时代,不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给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原料;并且帝国主义也有供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帮助中国轻工业发展。”而“轻工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发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①

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方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他们指出: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了输出商品,为了榨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垄断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建设了一些新式资本主义企业,使中国城乡商品经济获得了某些发展,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的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②,使独立的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

他们还指出:“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封建势力”是“中国经济的压迫者,经济发展的束缚者,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碍者”。“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军阀混战”,也“压迫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使其不能成长”,因此,“中国经济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失业,工人市民的生活困难,强盗的频繁增加,土匪的到处蜂起,饥寒交迫的游民贫民数百万数千万的存在,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封建的剥削所致”。所以“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③

① 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② 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③ 王昂:《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

因此，他们说：“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①

他们批判了托派主张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他们指出：这是“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这种把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看做完全同这一社会中的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离开，不去拿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这实是完全离开了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他们列举了中外历史上的事实，说明仅通过“商品经济本身还不能决定那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因“在阶级社会中，剥削的关系，也即是阶级的关系，是每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②

他们还揭穿了托派在这个问题上知识贫乏，为了符合自己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竟不惜把商品经济的概念都加以曲解。他们指出：“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对外贸易的发展，决不能证明这就等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拿它们的商品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中国农民的农产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国农产品的种类依照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而变动，决不就等于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当然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农村中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帝国主义商品（不但是工业品，而且也包含农产品）输入中国的农村，中国农产品以及原料输出外国，自然会使中国农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购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商品。但是这种发展，只是加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造成大

①② 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